

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如今,国民的绿化环保意识越来越强。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,但植树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。古人是如何鼓励植树的?又留下了哪些植树造林的佳话呢?

为百姓衣食住行提供更好保障

种树百株可得黄金一斤粮食八石

中国古代植树那些事儿

古人植树的 N 个理由

在我国,植树的历史非常悠久。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?除了今天的环保诉求,还有其他原因吗?

其实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林木的产出能够作为庄稼的补充,为百姓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好的保障。孟子曾提出:“五亩之宅,一夫所受,二亩半在田,二亩半在邑。田中不得有木,恐妨五谷,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。五十始衰,非帛不暖,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”这是说,要在种田的同时栽种桑树,以此养蚕,纺织衣物。

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,还能增收致富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那些有“千树枣”“千树栗”“千树橘”“千树萩”“千亩

竹”的人,堪称“素封”,他们虽然没有享受朝廷的俸禄,但是富裕程度可以比肩王侯将相。

行道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,两周时期就“列树以表道”,即在郊野大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,以此标明道路的延伸方向。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,更是周朝所崇尚的礼仪。秦朝大修驰道,对种树有详细要求:“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”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,行道树种类增加,不仅限于松树,杨、柳、榆、槐皆有之,种植范围也更加宽广,“自长安至于诸州,皆夹路树槐柳”。隋代开凿大运河时,运河边的御道两侧也有行道树。

此外,种树还有一个重要作用,就是作为军事屏障,战国时期的函谷关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。当时,函谷关附近拥有茂密的森林,不适宜大规模行军,其关隘作用因此大大提升。秦汉以来,用树来限制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,作用非常明显。蒙恬受命北御匈奴时,创造性地“以河为境,累石为城,树榆为塞”,即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塞,同时在外围栽种大量榆树,构成另一层关塞,极大地限制了匈奴骑马进攻的机动性,让匈奴骑兵到此不得不下马步行。失去了马的协助,匈奴骑兵在秦军面前变得脆弱,易于击溃。

历史名人与植树的 N 个故事

翻阅史册,不难发现,许多历史名人与树有着不解之缘。

西周时,有位名叫沙俊其的名将,武艺高强,骁勇善战。沙俊其每打一次胜仗,就令军士“人种一树,以庆武功”——以种树来庆功,实在是独树一帜。后来,就连抓到俘虏,他也令军士去种树庆贺,以至于他率领的军队形成了“庆功栽杨”的独特庆功习惯。这一习惯影响颇远,许多诸侯国效仿这种一举数得、别出心裁的庆功形式。

三国时期,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,乐善好施。董奉隐居庐山时,为贫苦百姓看病,分文不取,只要求病人痊愈后按照病情轻重在他的住所前后栽种杏树,病重者栽 5 株,病轻者栽 1 株。数十年光阴,董奉的房前屋后竟有 10 万余株杏树。每当杏熟,董奉就用杏子换来谷米救济贫苦百姓,人们称这片杏林为“董仙杏林”,后世遂以“誉满杏林”称颂医家。

三国时期,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,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:“臣家有桑八百株,子孙衣食,自可足用。”他栽种 800 株桑树,作为子女的生活来源,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。一

代名相,两袖清风,死后留给子孙的唯有他栽种的桑树,令人不胜感慨。

宋代改革家、诗人王安石对种竹、植桃、栽柳极有兴趣,并为此赋诗:“乘兴吾庐知未厌,故移修竹似延雒”“舍南舍北皆种桃,东风一吹数尺高”“移柳当门何啻王,穿松作径适成三”……他对树木的热爱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,大力倡导绿化,亲手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,并赋诗记之:“柳州柳刺史,种柳柳江边”“手种黄柑两百株,春来新叶遍城隅”。此外,他还总结出许多绿化的方法和技巧,“能顺木之天,以致其性”,“其本欲舒,其培欲平,其土欲故,其筑欲密”。这些经验之谈,今天读来依然有指导意义。

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,令军士在河西走廊沿途植柳 26 万株,世称“左公柳”,至今仍为西北人民称道。^{①②}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鼓励植树的 N 种方法

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国家明令规定的植树节,但一直保留着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。那么,古人是怎么鼓励植树的呢?

《礼记》记载:“孟春之月,盛德在木。”早在先秦时期,就设有专门掌管国家山林的官员——“林衡”、“山虞”,《周礼》对这两个职位有明确的描述:“山虞掌山林之政令,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,仲冬斩阳木,仲夏斩阴木,凡服耜,斩季材,以时入之,令万民时斩材,有期日,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,凡窃木者有刑罚”,“山虞以时斩材,而林衡受法于

山虞,以严其戒,一有不平,则计其守其之功过而赏罚之矣”。山虞职位较高,主要负责制订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,对树木的栽种、砍伐进行决策;林衡职位相对较低,受山虞领导,主要职责是巡视山林、执行禁令等。

即便是在诸侯割据、八方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,植树依然盛行。齐国名相管仲要求百姓在房前屋后种桑麻,在城墙周围种荆棘,以巩固城防,“能树百棵使繁茂者,置之黄金一斤,直食八石”,也就是说,种 100 棵树并使其长势繁盛,就可以获得黄金一斤、粮食八

石的奖励。

宋太祖赵匡胤根据植树数量把百姓分成五等,并明确规定,凡是垦荒植桑枣者,不缴田租;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,可晋升一级。宋朝对植树的重视程度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明清时期,植树规模更大。明太祖朱元璋有“植树皇帝”之称,甫一登基就诏令天下:“凡民户有田者,须种桑麻粟枣各二百株。”这道诏令一经颁布,仅金陵钟山等地就种植桑麻 50 多万株,而后逐年递增,蔚然成风。到朱元璋退位时,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株之多。

三国时期,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,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:“臣家有桑八百株,子孙衣食,自可足用。”他栽种 800 株桑树,作为子女的生活来源,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。一

